

香港傳真

(香港) 桑尼研究有限公司
中國稅務雜誌社綜合研究組

No. 2011-11

2011年3月7日

駁熊蕾對張聞天的誣陷

何方¹

最近經幾位友人介紹，看了熊蕾小姐在烏有之鄉網上發表的題為〈張聞天秘書的有趣回憶〉的文章（還刊登在了《香港傳真》上）。其中對我的“說道”，不管是非如何，本可以不論，我也會照例置之不理。但她對“我黨在一個相當長時期的重要領導人”（鄧小平語）張聞天的攻擊誣陷和冷嘲熱諷，卻不能不做點分析批判。因為張聞天在革命的歲月中，曾擔任過中共中央總書記（1935~1938年），對中國革命作出過重大貢獻，並長期參加政治局，先後任常委（1934~1943年）、委員（1945~1956年）和候補委員（1956年第八屆起），擔

¹ 文末所附三篇文章〈張聞天與毛澤東關係的演變〉、〈張聞天與周恩來〉、〈張聞天與陳毅〉，為拙著《黨史筆記——從遵義會議到延安整風》（香港利文出版社2008年）和《從延安一路走來的反思——何方自述》（香港明報出版有限公司2007年）兩書的有關章節——作者註。

負重要領導工作。1959年廬山會議時同彭德懷一起受到錯誤批判和處理，此後又長期受到壓制，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1979年8月25日，黨中央為他的平反昭雪舉行了隆重的追悼大會，由陳雲主持會議，鄧小平代表黨中央致悼詞，宣佈為他一生的革命活動“作出全面、公正的評價”，“決定為他平反和恢復名譽”，提出對“強加在張聞天同志身上的一切誣陷不實之詞都應統統推倒”，還號召全黨向張聞天同志學習。但是不想在30多年後，對張聞天的一些誣陷不實之詞，又由這位熊小姐在媒體上表而出之了。這當然是不應該默爾而息的。

人都總會有缺點，張聞天當不例外。人又是社會的人，也包括張聞天在內。無論生前和死後，對他的社會活動，任何人都有加以評說或“說道”的權利。可是評說得從事實出發，後人對於前人的評說尤其如此。已經逝去的做出了豐功偉績的前人，對於一些不符事實的竊竊私議，生前不會計較，身後不可能辯駁，我們後人的評說更不能罔顧事實了。罔顧事實的評說或“說道”，就是信口雌黃或無端誣讒了。

可是熊小姐的文章怎麼樣呢？

熊小姐一定要把對我的指責株連到張聞天頭上。為此，她首先硬要把我說成張聞天的秘書，其實我從來沒有當過張聞天的秘書，這是在我的文中作了詳細交代的。接著就把我的一些事情當作張聞天的事情加以撻伐。例如我說，“根據兩年的觀察體會，陳毅和張聞天的作風大不相同，陳毅作風顯得粗獷和豪放、工作放手、不講細節”，“但有時在外交場合就顯得不完全適應了”，並舉了兩個例子。除一次因開玩笑引起印度國防部長梅農的誤會外，再就是說1965年9月記者招待會的講話不但打擊一大片，還希望早點爆發大戰，這就有點“不外交”了。這裡說的明明是我的觀察體會，不論對這次記者招待會如何看（不過可以肯定，不但現在，就是今後也永遠不會再有這種深受

熊小姐讚賞的“新中國歷史上最牛的記者招待會”了)，都與張聞天毫無關係。但熊小姐卻一定要把他株連進來，說陳老總那次談話，“何方、張聞天認為‘不外交’”。熊小姐有什麼理由一定要拉上張聞天？又如，為克什米爾公主號死難烈士寫悼詞（李德全講話稿）一事，被我列為所承擔任務和正常工作安排以外的“其他零碎的事情”，不管用詞是否妥當，都與張聞天毫無關係，但熊小姐還是要把張聞天株連到這一提法中去，說：“當時，身為外交部常務副部長的張聞天和他的秘書何方也是把這個事情（指敵特炸克什米爾公主號事）當成‘零碎的事情’來對待。”熊小姐沒有一絲一毫的根據證明張聞天是把這件事當成“零碎的事情”來對待的。就是對於我，也純屬蓄意歪曲。因為我是在敘述我的經常任務和工作安排如起草和審改有關外交方面的報告和文書、編寫內部通報和刊物等的時候，把一些偶然的臨時性工作列為“其他零碎的事情”。也許這種用詞不妥，但不管怎麼說，這只是指我幾項大宗的經常工作以外的工作，而不是說哪項工作重要哪項工作不重要。這是在文中交代清楚了，好像是不會引起什麼誤會的吧？為什麼要由此說我不把克什米爾公主號事件當成“特別緊急的事”，還株連到張聞天，說他也如此呢？熊小姐大力撻伐張聞天對“克什米爾公主號”事件的處理，說他“漫不經心掉以輕心和進退失據”、“表現得完全不稱職”等，可是事實呢？張聞天在處理“克什米爾公主號”事件中犯的是什麼錯誤？“漫不經心掉以輕心和進退失據”表現在什麼地方？又何以見得“完全不稱職”？是講錯了什麼話，還是做錯了什麼事？是沒有執行周總理的統一部署，還是自己另搞一套？對這些，熊小姐都沒說出個子丑寅卯。惟一拿來作為“罪證”的就是張聞天晚上 10 點鐘睡覺的習慣。但就是這個習慣，那幾天張聞天也並沒遵守。我記得，單是他半夜參加中央的會，討論對這一事件的應對辦法就有兩次。至於那天董越千按照周總理的具體指示，

當晚通知我駐香港新華分社，著其立即向港英當局交涉。他第二天又向張聞天彙報，張聞天即派人找英國代辦交涉。這有什麼不對呢？是當時這樣的通盤安排不妥，還是董越千不敢晚上通報張聞天因而誤了大事？據我所知，事後並沒有因此批評過董越千，更沒聽說領導上批評張聞天不該按時睡覺。熊小姐在這裡找的是什麼茬呢？

看來，熊小姐對“克什米爾公主號”事件至今也並沒弄清楚。她大約只是從某些父輩那裡得來一點道聽途說，以訛傳訛。沒弄清楚可以繼續弄清楚，不講具體事實就給張聞天戴帽子，少說也是不應該吧。

熊小姐的文章對張聞天的工作能力和領導水平多所諷刺挖苦，鄙夷之神情溢於言表。有位略為知道熊蕾的朋友對我說，熊蕾有什麼資格評論張聞天？我乍一聽還以為有點苛求，似乎對一個晚輩的要求高了一些。但後來一想，還覺得真有理。熊小姐對張聞天有多少瞭解？她既沒有和張聞天同過事，大概也沒有在張聞天領導下工作過，更加重要、更加不可饒恕的是她根本沒有讀過張聞天的《選集》、《文集》等著作和大量研究張聞天的材料。張聞天是已有歷史定論並得到全國知識界普遍尊敬的前中共領導人，熊小姐只靠一點道聽途說和以訛傳訛，就說三道四、肆意貶損。這不僅有失後學者應有的態度，而且不能不說是自我膨脹得有些不知所為了。

為什麼斷言熊蕾沒有讀過張聞天的著作和有關研究材料呢？這是她自己的博文透露的信息。例如她說，在“張聞天擅長的研究領域，張聞天照樣沒有留下像樣的東西”。這就是熊蕾的無知了。她不知道：張聞天在東北做地方工作時，根據研究提出的新中國經濟構成的論斷被吸收和納入七屆二中全會的決議中；關於解放後黨的工作中心應從農村轉到城市，應從一切為了戰爭轉變為以經濟建設為主；土地改革後農村不應急於向生產合作社過渡，應該先搞供銷合作社，並主張入股分紅……張聞天的研究成果實在不勝枚舉，大都反映在他的

著作裡，可惜熊小姐竟然完全不瞭解。就以在外交部任常務副部長這段時間為例，國際問題研究界都知道，張聞天是新中國國際問題和對外關係研究的開拓者，是中國第一批國際問題研究機構（如研究所、出版社、外交學院等）的創辦人。還有一件重大調研成果特別值得一提，就是他對當今國際形勢和時代特徵的認識和判斷。還在 20 世紀 50 年代，當毛主席仍然堅持二戰後還是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即戰爭與革命時代），因此無產階級革命取得勝利的國家，它的對外政策和國際主義義務就是推進世界革命。但是張聞天通過深入研究，已經得出結論：新的世界大戰打不起來，在國際關係中和平共處已成為主流，中國的主要任務是把自己的事情辦好，集中力量搞經濟建設，因此對外政策的重點不是推進世界革命，而是實現同資本主義世界和平共處。1956 年 8 月，他曾組織人寫了一篇長達萬餘言的文章〈論和平共處〉，並經過外交部的領導會議討論，準備在黨的第八次代表大會上作一發言。後因和領導意見不同，發言沒有講成，直到他去世後，文章才在《張聞天文集》第四卷中首次發表。由於沒有採納張聞天的意見，堅持打倒帝修反、推進世界革命的外交路線，國內又執行以階級鬥爭為綱和準備打仗的政策，結果就使我國喪失了為時 30 多年的有史以來第一次最好的發展機遇。直到 1985 年鄧小平才扭轉過來，改變了對戰爭與和平的看法，放棄了“戰爭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的判斷，實行了改革開放，使經濟得到快速發展。張聞天調查研究的成果，實在不可勝數，只是熊蕾小姐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就是了。

熊小姐擺出一副架勢，似乎她對張聞天很瞭解，“兩年前就質疑過張聞天領導外交工作的能力，以及他對同志對工作的責任心”。她以“老外交部”和知情人物的口吻說，沒有看出張聞天在外交部“有任何的建樹，相反在‘克什米爾公主號’這樣的危機處理中，他的表現完全是不稱職的”。關於“克什米爾公主號”問題，我們在前面已

經說過，這裡就不再重複。單說張聞天在外交部任常務副部長的工作，那真是有聲有色，不但得到中央領導的信任和讚許，就是外交部內部，除了由於他行事正直、要求嚴格，得罪過少數幾個中層幹部外，在全部可說是有口皆碑的。他的建樹實在難以盡述。例如他關於外交部特別是地區司和駐外使館的主要任務和經常工作是調查研究的報告（這一報告是經由毛主席和周總理批准轉發各駐外使館的），就解決了外交部工作的一個重大問題。因為建國初期，部內各司和駐外使館不少同志不知道日常的主要工作是什麼，有些同志甚至誤以為就是請客吃飯、送往迎來。張聞天不但從根本上解決了外交工作的主要任務，就是做國家的耳目，為國內建設服務；而且為內部業務的運轉制定出了詳細的規章制度。應該說，張聞天在周總理支持下，為外交部內部業務的建設和運轉奠定了基礎，至今仍然行之有效。這些事實說明，熊蕾太不瞭解外交部初建時期的情況了。

關於張聞天在外交部有無建樹，中央領導如周恩來同熊蕾的看法就完全相反。這是有胡喬木的書為證的：“1958年陳毅同志接替恩來同志擔任外交部長時，中央曾經考慮是否需要聞天同志留在外交部。恩來同志認為聞天同志在外交部工作做得比較仔細（例如他曾到我國駐外使館作過一次巡迴視察，這種工作在他以前和以後的外交部領導人都沒有做過），主張把他留下。可見聞天同志這一段的工作是得到中央好評的。”²

有意思的是，胡喬木這裡轉述周恩來讚揚的張聞天對駐外使館的巡視，卻被我們的熊小姐斥為浪費，說“這種不為出訪而專門進行的出國調研，在外匯緊缺的年代，有多大必要？有多大實效？”這真是反映了不同的境界和眼光，高下立見。張聞天的巡視工作，不說如何有益於部領導對駐外使領館情況的瞭解、幫助使館解決問題，如使館

² 胡喬木：〈回憶張聞天同志〉，《胡喬木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386頁。

的主要任務是什麼；主要打交道的對象是政府不是群眾；如何把調研工作提到首位；如何正確認識和評價駐在國；以及介紹國內和國際形勢，幫助解決使館存在的工作問題、團結問題等等，這還都是從內部工作來談巡視的實在收穫。如果從大的方面講，那意義就更大了。例如，通過對駐東南亞使館的巡視，更認清了民族主義國家的情況，更明確了國際關係的分類，不再把民族主義國家籠統歸之於資本主義世界，而把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不少是帝國主義）和民族主義國家區別開來。在政策上也把民族主義國家當作我們的團結對象或直接同盟軍，要爭取同民族主義國家長期和平共處，等等。這也是巡視形勢報告受到中央和有關部門重視的一個原因。再說，張聞天當時去的幾個國家，都還窮得很，可見不是為了去玩的，這就更不待言了。

至於熊小姐提到我為張聞天起草文稿一事，實際上我不但為張聞天起草過報告和文章，也參加過為周恩來總理起草報告和文稿。因為這都是按照他們的指示和交代起草，所以有的文章改動就不太多（當然也有他們的想法改變了又推倒重來的），這當然談不上起草者的水平高低，更不能以此說領導人“不作為”。對這類跟隨領導工作的情況，不知道是熊蕾小姐真不瞭解，還是要故意找茬。

還有個罔顧常識的事，就是她把文化大革命初期兩派鬥爭中一派貼了一張保陳毅的“91人大字報”和1959年廬山會議上張聞天被打倒後卻沒有人出來保他來作對比。熊小姐認為這證明擁護陳毅的人很多，而擁護張聞天的人一個也沒有。這真像個一千年前或一千年後的人在發言。熊小姐難道連這是兩種不同政治背景下的事情都不知道嗎？恐怕未必吧！這兩種情況能不能比，用不著上了年紀，人們也都一清二楚。廬山會議上同張聞天一起被打倒的還有彭德懷元帥，也沒有一個人貼大字報保他，難道擁護他的人還少嗎？在那個時候，慢說是出面保他們，在整個中央委員會和所有黨的精英裡面，連一個站出

來說句公道話的人都沒有。所以文革後進行撥亂反正，首先就完全推倒了廬山會議的錯誤決定和隨之而來的反右傾運動，對於那次受了錯誤批判和處理的人都進行了平反昭雪。這就是為什麼中央對張聞天舉行了隆重的平反昭雪追悼大會，對陳毅卻沒有什麼平反昭雪問題。因為陳毅同志並沒有被打倒。文革中有“批”有“保”是當時的普遍現象，豈能同 1959 年運動只能批（打倒）不能保相提並論？像熊小姐這樣立論，我還真是聞所未聞呢。

在黨史研究中，近年來不少同志做了有益的工作，澄清了許多問題。熊小姐似乎對此茫然無知。她把研究遵義會議後張聞天的任職說成是在為張聞天爭最高領導的地位。這本來就有點文不對題。何況她又說，“歷史給過張聞天‘最高領導’的機會。可惜，張聞天的才具人品辜負了這樣的機會”。這不是自己已經承認張聞天的最高領導地位了嗎？只不過在熊小姐看來，張聞天在總書記任內又是“無所作為”，“辜負了歷史給的機會”。也許熊小姐確實對黨史一竅不通，那我就摘其要者簡單地談一下現已人所共知的張聞天擔任總書記期間幾項歷史性的重大貢獻：

在遵義會議上作了批判“左”傾軍事路線的重要報告，並受會議委託起草了《遵義會議決議》。這是在中國革命史上第一次對革命戰爭的戰略戰術所作比較全面系統的總結；

以他為首的領導集體率領中央紅軍完成了萬里長征，並順利地落腳於陝北；

主持瓦窯堡會議，制定了從內戰轉向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歷史性戰略（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因在直羅鎮前線指揮作戰未參與制定，但回信表示完全擁護）；

1936 年西安事變發生後立即提出和平解決的方針（毛澤東開始時主張“除蔣”、“審蔣”，並領銜通電全國），爭取到參與事變的

處理；

在 1937 年的洛川會議上提出並論述了抗日戰爭為持久戰的論斷，為確定八路軍抗戰時期的戰略戰術作出了貢獻；

遵義會議後停止了“左”傾肅反(自己人殺自己人)和其他整人的運動，在我黨生活上創造了一個生動活潑局面的歷史時期，引來大批知識分子參加革命，使革命力量得到空前發展；

由於他不貪權不攬權，因而實現了中央領導權的平穩過渡，把毛澤東推上領袖地位，做到了“扶上馬，送一程”；以及其他等等，實在不可盡言。

事實證明，張聞天不僅沒有辜負歷史“給過”的機會，而是在這個“機遇”時期出色地完成了這一時期的歷史任務。希望熊小姐認真學習一下這段歷史。

末了，我想以熊向暉同志的同事和戰友（我們是從 1954 年日內瓦會議相識和相交的）的身份，奉勸熊蕾幾句話：務必多讀點書，務必戒驕戒躁，務必不要胡亂製造新聞。

附錄一：張聞天與毛澤東關係的演變

為了進一步瞭解張聞天在延安整風中以及此後的遭遇，有必要先簡單談一下張聞天同毛澤東關係的發展變化。

張聞天與毛澤東的關係大約可以分為三大階段，每段又可細分成兩個時期，這就是：張聞天在上海中央工作和進入中央蘇區後，是他犯“左”傾錯誤和毛澤東受壓的三年多；長征開始到延安整風的六年，是兩人相互配合和合作較好的時期，只是頭三年中央領導以張聞天為首，後三年確立了毛澤東的領袖地位；整風後是張聞天離開中央領導做點局部工作和受迫害到死大約各為一半的30年。

一、紅軍長征前的張毛關係

張聞天和毛澤東第一次見面，是在1933年初臨時中央從上海進入中央蘇區後，但兩人的相知卻要早得多。在中國共產黨成立前，他們就都已參加了中國少年學會。³ 1920年《少年中國》第一卷第8期同時發表了兩人的入會消息，此後他們的行蹤在《少年中國》上又時有披露。因此，作為會友，他們不但互相知道，還會讀到對方有關的材料。不過由於毛澤東只是“少年中國”的一員，沒有擔任什麼領導職務和有什麼出色表現，所以毛澤東本人和官方黨史編纂學多不大提毛和“少年中國”的關係，而喜歡大講毛創辦的“新民學會”和《湘江評論》。當然，在張毛關係上，真正有點影響的還是1931年張聞天回國參加中央工作後（前任宣傳部長列席常委會，從臨時中央成立起即出任常委）。在此期間，兩人並不相識，也無成見，但卻發生了一些相互有關的事情，主要就是張聞天由於執行“左”傾路線，曾參與對毛澤東的批評和壓制。例如張多次批評中央蘇區領導的“右傾”、“狹隘經驗論”，這當然包括甚至首先指的就是毛澤東

³ 張聞天1919年12月在南京參加該會，此後又常在該會辦的《少年中國》和《少年世界》上發表文章。毛澤東於1920年入會。

（不過也有批評得並不錯的，如 1932 年 4 月 11 日在常委會上批評過去中央蘇區“以 AB 團的問題，而形成黨內恐怖”、“肅反工作是成為最大的罪惡”，⁴ 這也都直接與毛澤東有關）。1931 年 10 月 6 日的常委會上，他不但同意博古批評毛的“保守、退卻”和“分散工作的觀點”，還提出“澤東可調回後方做蘇維埃工作”。⁵ 不過由於沒有成見，所以張聞天另一方面的意見又起了有利於毛澤東的作用，如反對向忠發兼任中華蘇維埃政府主席而促成了毛澤東出任此職。⁶ 直到進入中央蘇區，張聞天才同毛澤東見面並一起工作。而他下車伊始又參與了博古提出的反“羅明路線”的鬥爭，寫文章、作報告，一時表現得異常積極。不過後來他在整風中反省說，“當時我反對羅明路線時，主觀上並未想到這是為了要反對毛澤東同志。當時我覺得毛澤東同志已經不在其位，再去反已經沒有什麼意義。這從我寫的文章中也可看出”。⁷ 反“羅明路線”特別是反“鄧、毛、謝、古”，他也主要是上網上线寫文章，照他在《反省筆記》中所說，追查“江西小組織系統”、“直接針對毛澤東同志的”是羅邁。雖然如此，這次積極參加，終究是他的一個嚴重錯誤，並在毛澤東心中記下一筆賬，幾乎講了一輩子。

不過平心而論，張聞天除參與反“羅明路線”外，總的看來，在蘇區近兩年，他同毛的關係還算不錯，接觸也較多，並促成了他們在某些政策思想上的接近和相互關係的靠攏。張聞天先是分管政府工作，後來乾脆被調去做政府工作（任人民委員會主席，相當於總理，毛仍為蘇維埃主席），不但工作關係密切，還比鄰而居，來往頻繁，不時見面。張聞天接觸實際後，政策思想逐漸擺脫“左”的一套，同博古、李德的矛盾趨於激化，其中受毛澤東的影響也可能是一個重要因素，特別是在軍事問題上。對於兩人合著的《區鄉蘇維埃怎樣工作》，他就對人說，“我這是效法毛澤東同志的辦法呵”（指開調查會等）。對兩人在蘇區的關係，包括張對毛生病

⁴ 張培森主編：《張聞天年譜（上卷）》，中共黨史出版社 2000 年，第 161 頁。

⁵ 張培森主編：《張聞天年譜（上卷）》第 181 頁。

⁶ 章學新主編：《任弼時傳》，中央文獻出版社 1994 年，第 201 頁；凌步機：〈60 年前的一次開國大典〉，《中華兒女（國內版）》2000 年第 4 期。

⁷ 張聞天：《反省筆記（1943 年）》，未公開出版。

的關心、支持共產國際不同意讓毛到蘇聯養病等，時任國民經濟部部長的吳亮平曾有較詳細的回憶。如說，他們“通過相互接觸，達到相互瞭解，逐漸走向接近。可以說，張聞天同志後來在遵義會議的轉變，也是與他這一段時間受到毛澤東同志的影響有關的”。⁸

可是有些黨史著作卻喜歡強調張聞天來到瑞金以後，長達一年半的時間對毛澤東毫不瞭解。⁹ 其實這是對張聞天《反省筆記》中幾句話的誤解，屬於望文生義。因為就全文的精神看，張聞天檢討的對毛不瞭解也沒想瞭解，是指自己沒有認識到毛澤東是正確路線的代表和應當成為黨的領袖人物。被誤解的原話是：“同他（指毛）關係也還平常，他的文章，我均給他在鬥爭報上發表過。但他究竟是個什麼人，他有些什麼主張與本領，我是不瞭解，也並沒有想去瞭解過的。”又如另一地方談到自己“從來沒有想搶著當總書記”，然而對博古當總書記，“他爬在我上面，我總覺得他‘不配’（至於爬在別的同志，如毛澤東同志等的頭上‘配不配’，我當然沒有想）。”這裡又特意提到毛，可見上面談的“瞭解”、“本領”等，都是指毛澤東的路線和領導，並不是真的相處一年半竟“毫不瞭解”。當然，正如張聞天檢討長征出發前他能和毛澤東合作的原因之一時說的，“我一進中央蘇區，不重視毛同志是事實。但並無特別仇視或有意要打擊他的心理，也是事實”。¹⁰ 因此可以說，張對毛確無成見，進入蘇區後也沒有反對過毛（他認為反對“羅明路線”不是反毛），但卻並不十分尊重，甚至有點看不大起，認為他理論水平不高、性情粗暴等。

從毛澤東這方面來說，在張聞天到來前，任弼時、項英等已通過贛南會議和寧都會議剝奪了他的黨權和軍權，早已使他處於半靠邊站狀態。這

⁸ 吳亮平：〈為真理而鬥爭的一生〉，《回憶張聞天》，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第 49~60 頁。

⁹ 楊奎松：《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第 40 頁。書中與此類似的一些誤解還有一些，如第 118~119 頁提到，康生講了一件“鮮為人知”的事，就是如果不搞整風，“毛澤東幾乎不敢來黨校做報告”。這倒真使我等當時的“一般黨員幹部”感到有點“匪夷所思”，因為這是“千真萬確”不可能的。即使毛澤東喜歡講極而言之話，也是“不敢去作整風報告”（就是“不敢”發動整風），而不是什麼報告都“不敢做”。這類誤解常被一些人抄來抄去，所以特為在此一提。

¹⁰ 張聞天：《反省筆記（1943 年）》。

時直接壓制他的也是博古、李德等，和張聞天則無直接的重大衝突，因此關係“還平常”。並且隨著張聞天思想的轉變，兩人相互瞭解的進一步加深，還使得後來發展到坦誠相見，相互傾訴對博古中央和最高“三人團”的不滿，並準備同他們進行鬥爭。沒有這個基礎，遵義會議是開不成的，當然也談不上此後五六年的合作。

但在看毛澤東同張聞天的關係上，也不可忽略另一方面。正如毛毛在〈父親鄧小平在動亂歲月〉中所說，“毛澤東是一個偉人，但同時又是一個性情中人，他記怨又記恩，看人和處理人不免帶有很強的感情色彩”。¹¹ 只有那些受個人崇拜影響較深和不瞭解領導人之間關係的黨史工作者才會說“毛澤東是不記個人恩怨的”。¹² 所以他在蘇區對張聞天的態度還有影響深遠的以下幾點。第一，張聞天是批評和壓制他的“左”派中央的第二把手，曾經參與批評過他，特別是反“鄧毛謝古”。這是他長期耿耿於懷，有適當機會總要算賬的。第二，對於張聞天這種初出茅廬，不憑工作成績和實際經驗，只靠從莫斯科帶回“幾麻袋教條”，就躍居高位，發號施令，他從心底裡就不服，甚至鄙夷。第三，對張聞天被大家看作理論家，三天兩頭寫文章，動輒引證馬列，既引起他的反感，也對他形成很大壓力。這些因素即使在同張聞天合作中也難免時有顯露，在相當程度上還是造成張聞天後半生不幸遭遇的根子。

二、長征後整風前的張毛關係

自從長征出發前張聞天把對博古和最高“三人團”不滿完全向毛澤東坦白起，他們的關係就進入了第二階段。這時相互間不但有了較深的瞭解（否則不會談及如此重要和深層的問題），而且有了黨內鬥爭的共同目標（首先是反最高“三人團”的軍事路線和專斷作風）。這就更增進了相互間的瞭解，並終於形成反對李德、博古領導的所謂“中央隊三人團”，

¹¹ 毛毛：〈父親鄧小平在動亂歲月〉，《中華兒女（國內版）》1999年第9期。

¹² 馮建輝：《從陳獨秀到毛澤東》，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第463~469頁。

用張聞天的話說，就是“給遵義會議的偉大勝利放下了物質基礎”。¹³

長征後，兩人接近和合作的根本原因，主要是政見的相同。這可從兩方面來說。從大的方面或長遠講，兩人都是獻身革命，志同道合，也就是毛澤東在整風時說的，在反對蔣介石等問題的大方向上是一致的。從當時情況或近期目標說，他們需要攜手進行共同鬥爭，以改變李德、博古的指揮和領導，從危難中挽救紅軍、挽救革命。這是關係到黨中央和紅軍生死存亡的問題，所以其他一切問題（如毛的個人恩怨和雙方的彼此看不起等）都可暫時拋開或加以擱置，而必須集中力量抓這一當務之急。主客觀條件還使他們在這一革命形勢和戰略大轉變時期必須成為主要的一對合作者。

毛澤東無疑是正確軍事路線的代表和反對“左”傾中央的靈魂，但卻不便和很難直接出面領導這場鬥爭。這是因為：第一，他雖經共產國際干預在六屆五中全會上由政治局候補委員昇為正式委員，但卻不是常委（或稱書記），而且實際上還處於無權地位；第二，從贛南會議和寧都會議被剝奪黨權軍權後，他同軍隊的指揮關係和直接聯繫中斷兩三年，號召力已大為削弱，何況老蘇區的軍政幹部還調換了一部分；第三，有如黃克誠所說，毛在肅反問題上傷害人太多和組織路線上的偏聽偏信等，曾使他失掉部分人心；¹⁴ 第四，從共產國際到中共中央幾年來批評他“右傾”、“狹隘經驗論”等，也有損於他的威信。因此，毛澤東知道，要反“左”就必須首先依靠從“左”傾陣營中分化出來並在中央名列第二的張聞天。雖然他對張聞天看不起甚至鄙夷，但為了改善自己的處境，也為了共同事業，所以“他才用很大耐心，隱忍著種種痛苦，極力接近張聞天”。因為“張聞天在中央、在相當一部分人中間是頗有影響的人物，不只因為他的地位和身份，而且還有他個人的為人和修養”，“只要能說服和爭取到張聞天，問題就解決了一大半。通過張聞天再影響、說服別人就容易多了。”¹⁵ 師哲的回憶錄不確切的地方頗多，但這段描述卻比較接近實際，證之以毛澤東在七大的講話：“大家要知道，如果沒有洛甫、王稼祥兩位同志從第三

¹³ 中央檔案館編：《遵義會議文獻》，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78頁。

¹⁴ 黃克誠：《黃克誠自述》，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85、100、101頁。

¹⁵ 師哲：《在歷史鉅人身邊——師哲回憶錄》，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第175~176頁。

次‘左’傾路線分化出來，就不可能開好遵義會議。”¹⁶ 可見，毛的接近和依靠張，是當時的客觀需要，是具體歷史條件決定的。許多黨史著作和個人回憶錄，把毛澤東描述成衆望所歸，說“大家都擁護毛澤東同志出來領導”，這大半是多年以後的認識，也是延安整風為黨史學定下的統一口徑，有些領導同志這樣寫《回憶錄》則是為了突出自己。其實，會後的許多事實說明，毛澤東的威信當時並未達到衆望所歸的程度，而是逐漸樹立起來的，其中就有張聞天的幫助。如在會理會議上，作為新上任的總書記和會議主持人，他支持毛澤東、批評林彪等人，其作用是無人能代替的。

從張聞天這方面來說，在廣昌戰役後已同博古決裂，再經過反五次“圍剿”失敗和倉皇長征，他對博古、李德的領導和指揮更完全失去信心。由於性格比較孤僻和不善交際，他同蘇區領導人的來往、交談都不多，對最高“三人團”和羅邁更為不滿，所以有意見就比較自然地對向無成見又曾在政府一起工作的毛澤東“坦白”了。而毛也有意和他接近，於是一拍即合。加之長征後兩人都處於半靠邊狀態，所以就經常交談和議論起來。張聞天雖進蘇區近兩年，還參加軍委，經常討論打仗，但終究是個文人，除戰略等大的方面有一定認識外，對打仗的具體問題並不熟悉。因此這方面就聽信毛澤東講的，對毛也更加佩服。由於長征途中爭論越來越尖銳，張聞天更進而萌發改變領導的念頭，並同毛、王（稼祥）等一起展開了對博古、李德的鬥爭。他的這種變化，主要是出於思想覺悟，為了拯救革命，正像他整風時說的，並不是想爭當總書記。事實上，遵義會議已經形成比較一致的意見由他代替博古擔任總書記，他還是再三推辭，拖了20來天實在推不掉才接任。¹⁷

當然，遵義會議能開好，王稼祥也是立了大功的。他比張聞天覺醒得

¹⁶ 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在七大的報告和講話集》，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年，第231頁。

¹⁷ 1997年3月22日楊尚昆會見劉英（陪見的有程中原、張培森等）時的談話，是楊尚昆在世時審改過發表的。《楊尚昆回憶錄》（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年）係他去世三年多後別人整理，故說法不同。按理當以他的原話（而非別人所編）為準（〈楊尚昆和劉英的一次談話〉，《百年潮》1998年第6期；張培森：〈毛澤東為何看重張聞天〉，《百年潮》2001年第10期）。

還要早，跟人醞釀交談的也更多，但說他“投了關鍵的一票”卻是言過其實。因為第一，他是在長征前的五中全會上才補選為中央委員和政治局候補委員的，在中央的地位與鄧發、凱豐等相當，其態度不可能起決定作用；第二，他因負傷，所擔任的軍委副主席和總政主任，在長征出發前就已分別由項英、李富春代替，遵義會議前他既無實職也無實權；第三，他從未進過中央領導核心，在軍隊中並無太大影響；第四，遵義會議上除博古、凱豐二人外，絕大多數都“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綱和意見”，已形成共識；並不是贊成和反對的意見只有一票之差，所以根本就談不上“關鍵的一票”。由此可見，許多黨史著作一直重複毛澤東有意抬高王稼祥和貶低張聞天這一論斷，還是受著“兩個凡是”和“句句是真理”的傳統影響。如果一定要講“關鍵的一票”，倒應該指周恩來。從表面上看，似乎張聞天起的作用最大。因為他作了“反報告”，為會議定下基調，又受委託起草決議，最後還當選為總書記。但實則不然。當時是最高“三人團”專政，他雖排名博古之後，卻並無實權。加之一直處於行軍打仗狀態，軍事第一，他在軍中又沒多大影響。周恩來可就不同了。他不但是中央常委和“三人團”成員，而且實際上是中央紅軍的統帥，威信高、影響大，對於改變“左”傾方針和領導，真正起著關鍵作用。試想，如果周恩來不從“三人團”中分化出來，將會是什麼情況。事實證明，他一站出來，博古、李德就沒轍了。所以，陳雲在所謂〈傳達提綱〉中要特別標出他，說是“擴大會中恩來同志及其他同志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綱和意見”，會議還決定他為“黨內委託的對於指揮軍事上下最後決心的負責者”，而毛澤東只是他“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¹⁸ 這都可看出他當時舉足輕重的作用。

遵義會議確立了以張聞天為首的新領導集體，其重要特點之一是毛澤東當選常委進入了中央領導核心。張聞天出任總書記後一開始就著重抓兩件事。一是實行集體領導，發揚民主。他鑒於博古過去領導獨斷專行，所以在他主持下開會較多，特別是開始時。這就是毛澤東後來批評的，“洛甫每天要開 20 餘人的中央會議”。¹⁹ 成立“三人軍事小組”後會已減少，

¹⁸ 中央檔案館編：《遵義會議文獻》第 42 頁。

¹⁹ 中央檔案館編：《遵義會議文獻》第 134 頁。

但重要問題仍要集體討論決定，絕不搞一言堂。毛澤東雖然不喜歡開會，但在成為領袖前還是要求適當多開會，²⁰ 使他的意見有發表機會並被採納。二是重視發揮毛澤東在軍事上的作用，“他決定由毛澤東同志負責軍事工作”。²¹ 因為從長征起他就非常佩服毛澤東的軍事才能。“二次回遵義後，我看出周恩來同志領導戰爭無把握，故我提議要毛澤東同志去前方當前敵總指揮。”²² 隨後他又同意了毛澤東提出的成立以周恩來為組長的“三人軍事小組”。長征途中，先後經過沙窩會議和 1935 年 9 月 12 日的俄界會議，才在他的主持下，先後決定毛澤東分工負責軍事工作和出任紅軍縮編後的陝甘支隊政委。²³ 從此，毛澤東和周恩來在軍事指揮系統中的地位就完全調了個個兒，由毛為周的助手變成了周為毛的助手。還應指出的是，紅軍到達陝北後，在張聞天主持召開的下寺灣政治局會議上（1935 年 11 月 3 日），又經他提議和會議通過成立新的中央軍委（名義稱西北軍委），由毛澤東任主席，周恩來、彭德懷任副主席。最後，還是在他主持下召開的洛川會議上（1937 年 8 月），確立了毛澤東在全國紅軍中的最高統帥地位。²⁴

單從上列的軍事方面即可看出，《人民日報》記者錢江和范偉國的下述論斷之真實可信：“翔實可靠的資料證明，張聞天在擔任總書記的三年多時間裡逐漸加深了對毛澤東的認識，一步步將毛澤東推向黨的領袖的崗位，並且‘扶上馬，送一程’。”²⁵

²⁰ 例如 1935 年 8 月 19 日的沙窩會議上，就是根據毛澤東的意見做出決定：“常委會每週至少一次，各部有臨時發生事件，由各部與書記商量，（必要時）召集臨時常委（會）”（張培森主編：《張聞天年譜（上卷）》第 260 頁）。

²¹ 楊尚昆：〈序〉，劉英著《我和張聞天命運與共的歷程》，中共黨史出版社 1997 年，第 3 頁。

²² 張聞天：《反省筆記（1943 年）》。

²³ 逢先知：《毛澤東年譜 1893~1949（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 1993 年，第 467、473 頁；金沖及：《毛澤東傳 1893~1949（上）》，中央文獻出版社 2004 年，第 360、364 頁；張培森主編：《張聞天年譜（上卷）》第 260、266 頁。

²⁴ 逢先知：《毛澤東年譜 1893~1949（中卷）》，第 15 頁；張培森主編：《張聞天年譜（上卷）》第 490 頁。

²⁵ 錢江、范偉國：〈是非功過張聞天〉，《中華兒女（國內版）》2000 年第 8 期。

不但軍事問題，而且在整個黨對各條戰線的領導上，作為總書記的張聞天和作為紅軍統帥的毛澤東，在這個時期也是互相尊重、密切合作，做到了珠聯璧合的。在他們的領導下，粉碎了張國燾的分裂陰謀，勝利完成長征，把陝北變成領導全國革命的聖地，特別是實現了從內戰向抗戰的偉大戰略轉變。他們合作之密切，從這件事也可看出：從1935年10月抵達陝北，到1938年9月的六中全會，單是兩人聯名（多署“洛毛”）發出的電報有檔案可查的即達286件。²⁶對他們來說，一生中兩年內與人聯署發電可能沒有比這再多的了。毛澤東雖然分工主管軍事（後來加上外交，即統戰），但有關方針政策和其他重大問題，張聞天也總是要和他磋商，注意徵求和尊重他的意見。標誌著黨的政治路線徹底轉變的瓦窯堡會議（1935年12月），就是二人相互尊重、密切合作的典型例證。這是我們前面說過的。而且會後由毛澤東傳達決議精神報告（後來標題為〈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積極分子會議，也是由總書記張聞天親自主持的。

兩人在重大問題上的相互支持、緊密配合，還能做到放棄自己原來的不成熟意見，接受對方的正確建議，體現了領導集體內的平等相待和民主作風。如處理西安事變，毛澤東就很快改變了他審蔣除蔣的一時想法（後來還作了檢討），同意了張聞天“爭取南京政府正統”和爭取“妥協派”的主張，也就是和平解決的方案。²⁷因為正像日本學者安藤正士所說，張聞天一開始就解決了如何對待國民黨政府和蔣介石兩個難題，為“制定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方針定下了基調”。²⁸而在紅軍東征問題上，則是張聞天放棄了他原先主張“北上寧夏”的方案，轉而支持毛澤東東征山西的建議。當時一些人對渡河東征想不通，博古、王稼祥反對，彭德懷猶豫，林彪不久前還提出把重點放到陝南。但張聞天堅決支持東征，不計較一些人

²⁶ 程中原：《張聞天傳》，當代中國出版社2000年，第318頁。

²⁷ 《張聞天在1935~1938（年譜）》，中共黨史出版社1997年，第159、162~163頁；逢先知：《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621、646頁；〈張聞天與西安事變〉、〈張聞天在我黨解決西安事變中的歷史作用〉，張培森主編《張聞天研究文集》，中共黨史出版社1990年，第216~239頁。

²⁸ 程慎元：〈日本學者評價張聞天對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貢獻〉，《張聞天研究文集》第三集，中共黨史出版社1997年，第595~598頁。

的閑話（如王稼祥說他沒主見，是跟毛澤東跑的“泥菩薩”），反而表示自己也要“到紅軍中去”，並代表常委宣佈：“中央領導隨主力行動”，後方組成以周恩來為首的中央局，顯示了總書記親自出征的決心。²⁹

直到 1938 年，張聞天同毛澤東的合作都是黨中央總書記同紅軍最高統帥之間的合作，實行集體領導，各按分工行事。張聞天尊重毛澤東對軍隊的指揮領導，但其他重大問題也徵求毛的意見。毛澤東除分工所管外，對其他問題如有意見總是向張聞天提出或建議開會討論解決，而不越俎代庖和隨意插手黨務、組織、宣傳等其他部門的具體事務。這本來是很正常的，也是歷史事實。但是延安整風創建的黨史學，為了突出毛澤東，總要把事情說成是：雖然從組織上講張聞天是總書記（1982 年起還按陳雲一個人的意見改成負總責），但出主意的還是毛主席，一切大政方針都是毛主席決定的。有的甚而說，張聞天“作風民主，對毛很尊重，處處以‘配角’自居”，保證了毛澤東的方針政策的貫徹執行。其實這些既無事實根據，道理上也講不通，只是人云亦云。這主要還是由於這些黨史學家嚴守延安整風定下的框架，只顧重複已有結論，而不顧歷史事實。其實，張聞天本人在延安整風時那種強大壓力下寫的《反省筆記》，也只是說能開好遵義會議他“不過是一個‘配角’而已”，³⁰ 其他更多說的是同毛澤東同志站在一條戰線上。即以我們上面列舉的處理西安事變和召開瓦窯堡會議這兩件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問題而論，張聞天顯然起了政治領導作用，絕對不能視為“配角”。至於遵義會議並未確立毛澤東對全黨全軍的領導，確立的是以張聞天為首的集體領導，我在第一篇筆記中就已作過論述，這裡就不再重複了。

但是也必須指出，張聞天同毛澤東這種總書記和紅軍統帥之間的合作，經過 1937 年“12 月會議”特別是 1938 年的六中全會，已發生了根本變化，成為主持日常黨務工作的書記同正在形成中的全黨全軍領袖之間

²⁹ 張聞天：《反省筆記（1943 年）》；程中原：《張聞天傳》第 330~332 頁；徐則浩：《王稼祥傳》，當代中國出版社 2006 年，第 252 頁；《彭德懷自述》，國際文化出版公司 1981 年，第 211 頁；張培森主編：《張聞天年譜（上卷）》第 290、296~297 頁；逢先知：《毛澤東年譜 1893~1949（上卷）》第 493 頁。

³⁰ 中央檔案館編：《遵義會議文獻》第 80 頁。

的合作。從此，在毛張關係上才可說張聞天做了“配角”，而且從整風起，連“配角”也不再是了。如上所述，“12月會議”在組織上的變動就是在名次上毛澤東排在了第一位。這當然不會是王明、康生輩的意思。從事前（蘇聯著重宣傳毛澤東）和事後（六中全會上王稼祥的傳達）的情況看，顯然是在貫徹斯大林和共產國際的意圖。這大概是與會者都有所理解的。而張聞天不僅心領神會，而且立即付諸實際，加以貫徹。正像許多後人和同代人的評價，³¹他是個光明磊落、豁達睿智的人，從來不爭權、不圖名，多次表示並不熱衷於當領導，而是對理論和研究工作有興趣。三年多名副其實的總書記，在歷史賦予的角色中他做出了卓越的貢獻。楊尚昆就說，“自從他主持黨中央日常工作以後，一改過去黨內那種家長制、一言堂的惡劣作風，黨中央的領導核心團結協調，互相配合，革命事業順利發展”。³²現在，這一歷史任務已經完成，從革命實踐中成長起來並得到上（共產國際）下（黨內幹部）認同的領袖已被“扶上馬”。面對這一新的形勢，他不戀棧、不消沉、激流勇退、甘當配角，全力支持毛澤東的領導。³³除做好按分工擔負的份內工作外，特別值得指出的是他還在兩個問題上對毛澤東起了重大作用。

一是支持毛澤東對王明及其他反對意見進行鬥爭。“12月會議”後毛澤東雖已排名首位，但處境卻有點孤立。這是因為：一來王明有點鬧獨立性，甚至想把中央移到武漢，不願延安使用中央名義；二來領導上對某些問題的認識還未取得完全一致。在這種情況下，張聞天總是同毛澤東站在一起，根據不同對象和不同問題，有時用領導人聯署形式如毛、洛、胡（劉少奇）等，有時用書記處名義，發出指示或答復問題，保證了中央的統一領導和毛澤東方針的貫徹執行。與此同時，他還一再提出要把總書記職位讓給毛，因毛不同意而拖了下來。他在《反省筆記》中說，“六中全會期

³¹ 參閱《回憶張聞天》、馮建輝著《從陳獨秀到毛澤東》、張培森主編《張聞天研究文集》等書。

³² 楊尚昆：〈紀念張聞天同志〉，《紀念張聞天》，黨史出版社1990年，第3頁。

³³ 這一變化也反映在聯署電報上。據張培森主編的《張聞天年譜》所載，1938年毛張聯名發報已大為減少，且署名順序毛在前的為多，不像以前絕大多數為“洛、毛”。六中全會後，他們的聯署電報已基本上沒有了。

間我雖未把總書記一職讓掉，但我的方針還是把工作逐漸轉移，而不是把持不放。自王明同志留延工作後，我即把政治局會議地點，移到楊家嶺毛澤東同志住處開，我只在形式上當主席，一切重大問題均由毛主席決定，……我實際上是做了宣傳教育部門的工作。”³⁴ 既然張聞天這時還保留著總書記（起碼是書記處書記）的頭銜，那麼毛澤東要和武漢的王明進行鬥爭，沒有張的同意或簽署，怎麼可以用書記處名義或代表中央意見呢？可見在毛澤東成為實際上黨的領袖後，張聞天的支持仍然是極其重要的。

二是在理論問題上張聞天也對毛澤東有不少幫助。延安時期是作為新民主主義理論與政策的毛澤東思想形成的時期，也是毛澤東本人理論創作的鼎盛時期。在這方面，他得到張聞天一些直接和間接的幫助，也就是說張聞天對新民主主義理論的形成做出過不小貢獻。中央到陝北後，張聞天長期主管黨的宣傳教育工作。他重視理論，組織學習，對毛澤東鑽研理論從正反兩方面都起了推動作用，包括書籍供應、研究氛圍、無形壓力等。直接貢獻那就更多了，毛澤東思想中不少問題都可找到他的蹤跡，一些名詞也是他在黨內首先使用而為毛澤東所沿用的，如“黨八股”、“文化人”等。這裡只舉兩個理論上的例子，以見一斑。一是關於中國革命基本問題的論述。張聞天留學蘇聯回國不久即參加了 1930 年代初著名的中國社會性質論戰。所起作用，有如參加論戰的一位積極分子薛暮橋所說，“張聞天同志是中國社會性質論戰勝利的奠基人”。³⁵ 此後，他先後在江西共大和陝北紅大，親自講授《中國革命基本問題》，內容包括中國革命的性質、任務、對象、動力、領導、前途等。到 1938 年我上抗大時已編成講義，連同他編著的《中國現代革命運動史》合稱《中國問題》，成為一門必修課。後來《毛選》所載〈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內容與之大同小異，而且其中有的章節張聞天還分工參與起草。³⁶ 又如他起草的《遵義會議決議》，實際上是第一次對中國革命戰爭戰略戰術的全面系統總結。而關於抗日戰爭戰略的持久戰問題，他從 1935 年 11 月起草《瓦窯堡會議決

³⁴ 張培森主編：《張聞天年譜（上卷）》第 555 頁。

³⁵ 薛暮橋：〈傑出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張聞天〉，《張聞天研究文集》第二集，中共黨史出版社 1993 年，第 25 頁。

³⁶ 張培森主編：《張聞天年譜（上卷）》第 624 頁。

議》起就曾一再提出。1937年8月洛川會議上，他關於抗日戰爭戰略是持久戰的論述更引起熱烈討論，會上毛澤東也作了精闢的概括。持久戰的戰略方針逐漸形成全黨共識，“由毛澤東充實、發展並構建為完整的思想理論體系”，於1938年寫出了《論持久戰》。³⁷

舉這幾個例子（實際上要比這多得多）只是要說明，在張聞天和毛澤東合作的過程中是一種互助的關係，而且很難說誰對誰幫助更大些。過去那種毛澤東是教育者和張聞天只是受教育者的說法（包括張的檢討和毛的認可），是不完全合乎事實的，是個人崇拜的一種表現。

但是，最後必須指出，在兩人合作得很好的這幾年中，相互間也還存在有隔閡，雖然不佔主導地位，但對日後卻有重大影響，所以先要簡單一提。從毛澤東方面來說，首先是因為同張聞天的合作多少帶有勉強性質。他本來就看不起張聞天，但卻不得不保持某種“君臣”關係（他戲稱張為“明君”，自己為“大帥”），心中自然不服。所以他對師哲說，“在長征路上，他才用很大的耐心，隱忍著種種痛苦，極力接近張聞天”。³⁸同張合作竟感到痛苦，其不得已之情溢於言表。隨著他權力的上昇和對張聞天需要的減弱，在同張的關係上就顯得越來越不耐煩了。而且這種厭煩情緒竟保持了一輩子。其次，他同張的作風、性格、愛好等也相差甚遠，造成看不慣和談不來。他把張聞天看成“洋房子先生”，“言必稱希臘”（指馬列），只瞭解蘇聯一些表面情況，對中國則“一事不懂”。而從張聞天這邊看，他通過長期實踐固然越來越佩服毛澤東的領導與軍事指揮才能，但同時也覺得實在不好相處。一是感到毛這個人容易猜疑和記怨，而且很厲害，在一起共事得處處留神（小心謹慎）。二是可能對毛的不大談馬列和新文化（特別是世界文明），而是言必中國“故紙堆”，有點不以為然。三是正像黃克誠所說，毛喜歡順著來的人（像康生之類），他卻不屑於此，也學不會，同毛合作有點出於相忍為黨，因而被毛批評為清高。總之，由於雙方存在諸如此類的因素，所以相互合作主要是基於政治上的需要，而缺乏私交，感情不深，做不到推誠相見。

³⁷ 程中原：〈洛川會議前後（第一節）〉，《張聞天傳》第13章，第453-454頁。

³⁸ 師哲：《在歷史鉅人身邊——師哲回憶錄》第175頁。

張聞天同毛澤東的這種合作關係到 1941 年就結束了。而且隨著上層整風的開始，張聞天也就永遠退出了中央領導。

三、延安整風後的張毛關係

從 1941~1945 年的整風期間，張聞天和毛澤東的關係完全是一種檢討者和批判者的關係。雖然這時張聞天還保留著政治局委員的名分，但已不起相應的作用，甚至有些意見都沒處提（例如他不同意搶救運動，但直到最後才同任弼時私下談起）。有關這期間的情況，後面將有一章專門談到，這裡暫付闕如。

延安整風以後，張聞天雖然在黨的七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政治局委員，“可是實際分工，只負責一個中央材料室，這是中央各部門中最小的一個單位。一個政治局委員，只管一個只有四五個人的小單位”。³⁹ 正好不久日本投降，中央決定開闢東北工作，他為了貫徹執行中央決定和自己深入實際，就懇切要求去東北做地方工作，並迅速得到中央和毛澤東的批准。⁴⁰ 從此，他就永遠結束了同毛澤東一起工作的歷史，先是變成一種間接的（即中間隔了幾層）領導和被領導關係，1959 年後，連這種關係也告中斷，完全被毛澤東打倒了。

我是 1945 年跟張聞天一起到東北的，1949 年起在他的直接領導下工作。以前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說過大意如下的一段話：在我看來，張聞天的革命生涯中有兩段時間顯得最為輝煌。首先是他擔任總書記那幾年，主持中央工作，為實現中國革命的戰略轉變、開展抗日統一戰線新局面，做出了歷史性的重大貢獻。其次就是在東北先後擔任合江和遼東省委書記期間。這兩個省，地方都不大，但工作比較全面，有一定的獨立自主性，容易發揮他的聰明才智。⁴¹

³⁹ 〈鄧力群談張聞天與劉英同志〉，《世紀風采》2000 年第 8 期。

⁴⁰ 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5）》，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 1991 年，第 279 頁。

⁴¹ 中共丹東市委黨史研究室編：《張聞天在遼東》，中共黨史出版社 1995 年，第 270 頁。

在東北工作期間，除參加七屆二中全會外，張聞天和毛澤東一直沒有見過面，大概也沒有什麼直接聯繫。因為那時毛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指揮解放戰爭上，而張卻是完全從事地方工作的，即使對毛澤東有報告和建議一般也要經過東北局。但張聞天的大體情況和重要意見，毛澤東還是有所瞭解的。例如關於農村供銷合作社的盈利分紅問題，張同劉少奇的爭論，後來他就明確表示同意張聞天的意見。⁴² 應該說，張聞天在東北的四年地方工作還確實顯示出了他的理論水平和領導才能，在實際工作中做出了重要貢獻。例如全國土地工作會議後掀起的土改中“左”的偏向就被他頂住了。還有些重大的理論與政策問題意見為黨中央和毛澤東吸收採納，如新中國國民經濟的構成等。當然也有些好的意見沒能引起應有的注意，如解放後必須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要對發展資本主義持積極態度，農業合作化不能操之過急等。對這後一點，薄一波曾嘆惜其因未受到“充分重視”而造成農村工作的損失。⁴³ 當然，這些都與張毛關係無直接聯繫，只是說明延安整風後兩人地位的根本變化和張雖仍持積極入世態度但已起不到很大作用了。

正當張聞天興致盎然和得心應手地從事地方工作之際，1950年他被調去做外交工作，派任駐聯合國首席代表。先是劉少奇等提議由章漢夫出任此職，並請示在蘇聯訪問的毛澤東。毛同周恩來商議後復電改派張聞天。⁴⁴ 這一調動除表明當時對外交工作還不熟悉和對聯合國工作的重視外，從張毛關係的角度看，也從工作性質、國際慣例、實際情況看，更不排除有“貶官”、“外放”之意，而不是過去人們說的表現了毛對張的器重。這樣考慮的根據是：第一，“外交工作授權有限”、駐外使節只是執

⁴²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卷）》，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第200~202頁。但某些情節和時間有誤：張給毛由東北局轉的三份電報是1949年5月寫的（《張聞天選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47~454頁；程中原：《張聞天傳（增訂版）》，當代中國出版社2006年，第635~640頁）。1950年2月他已調來北京。至於張劉爭論和毛當面表態的時間，則不知其詳。

⁴³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卷）》第208頁。

⁴⁴ 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1）》，中央文獻出版社1987年，第242頁；張培森主編：《張聞天年譜（下卷）》第900~901頁。

行政府指示、承辦些國內委託的事務性工作、參加日常交際活動、反映情況等，且毛澤東在張聞天出使前還特別提醒他：“不說話是金，少說話是銀”；⁴⁵ 第二，各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多為大使銜的副部長級，當時蘇聯東歐國家還沒有見到有政治局委員出任此職的；第三，因外交工作授權有限，社會主義國家常對一些“特殊人物”派出國工作，含有“外放”、“貶謫”之意，如蘇聯 1933 年派反布哈林鬥爭中被撤去教育部長職務的盧那恰爾斯基任駐西班牙公使、1957 年派被定為“反黨集團”成員的莫洛托夫任駐蒙古大使、1953 年維辛斯基由外交部長降為副部長、任駐聯合國代表，中國黨建國後派定為“教條宗派”並因對整風有點看法等原因在七大中委選舉中落選的王稼祥為首任駐蘇大使（毛澤東曾一再向斯大林告狀，一次還當面指王十年內戰時整他）⁴⁶ 等；第四，張聞天從未做過外事工作，而在延安時就從事外交（外國和國民黨）工作的重要領導幹部並不少，如葉劍英、楊尚昆、李克農等；第五，聯合國去不成，張聞天即被改派為駐蘇大使，以代替生病的王稼祥；第六，張聞天在駐蘇大使任內曾通過陳雲要求改行做經濟工作，陳雲寫信告訴他，毛主席對他有看法，認為他驕傲，表示不拿下他的政治局委員是不好另行安排工作的；⁴⁷ 第七，1952 年蘇共十九大，中國黨派以劉少奇為團長的代表團出席，團員有中央委員饒漱石、陳毅、王稼祥，候補委員劉長勝，然而卻沒有時為政治局委員的駐蘇大使張聞天。其政治歧視太過明顯，即不論黨內地位，也不合乎社會主義國家關係慣例，當時一些外國人就覺得奇怪。

改行不成，張聞天就決心搞一輩子外交工作和國際問題研究了，而且是一心一意，樂此不疲。十年外交工作中，延安整風後所受歧視有增無減，政治局委員的虛位和實際職務間的差距繼續拉大。早在東北，非政治局委員的同志如李富春等任東北局副書記時，他就只任常委兼一個小省的省委書記。政治局委員出任駐外大使的，在十多個社會主義國家中他也是罕見其匹。⁴⁸

⁴⁵ 張培森主編：《張聞天年譜（下卷）》第 907 頁。

⁴⁶ 師哲：《在歷史鉅人身邊——師哲回憶錄》第 451 頁。

⁴⁷ 張培森主編：《張聞天年譜（下卷）》第 940 頁。

⁴⁸ 據我所知，只有一位保共政治局委員，因係長期流亡蘇聯的一位老太太，後留下做了保加利亞駐蘇大使，不久即死於任所——作者註。

在大使任內，他同毛澤東既無直接工作關係，也無直接個人聯繫。與其他大使不同的，可能就是她經常積極通過外交部向毛澤東並中央反映情況和提建議，但很少聽到有什麼回音。後來周恩來感到工作實在太忙，對他做外交工作也還滿意，遂建議調他任外交部副部長協助周主持常務。這又開創了共產黨執政國家一個政治局委員當副部長的也許是空前絕後的特例。1956年，時隔11年（七大黨章規定為三年）召開黨的八大，張聞天作了充分準備，打算以〈論和平共處〉為題作個發言。⁴⁹ 按理，一個政治局委員要求在黨的代表大會上發一次言實屬正常，但卻並未獲准，說是關於國際形勢和外交政策有陳毅一篇發言就行了。⁵⁰ 因為在這之前好久就已內定陳毅代周恩來兼外交部長，所以一直不讓張聞天在這方面多出頭。⁵¹

張聞天十年外交期間同毛澤東的關係，一般說來也還是正常的。毛澤東絕不會重用張，張自己也明白，並已安心於外交工作和國際問題研究的開拓，做到了盡心盡責，而且建樹不少。關於國際形勢和外交政策常有分析和建議報送毛、周；對外交業務和內部建設更做了許多開創性和奠基性的工作。但他仍然憂國憂民、一直注視和考慮全局問題，有時也向毛寫信報告自己的看法和意見。對毛澤東定下的方針路線以及各項政策與作法，他都貫徹執行，照章辦事。他一貫謹言慎行，從未表現出對毛的不滿。但也使人感到，他對毛是有意見的，缺乏某些領導人那種“主席不離口”的崇拜感情。幫他起草文章或他自己親筆寫，一般都不用查找和引用毛澤東的語錄，例如他要我起草的在八大二次會上的發言〈關於美國經濟危機〉，在《紅旗》創刊號發表時，最後引毛澤東的話作結束，就是陳伯達給加上去的。平時看毛也是“無事不登三寶殿”。由於歷史關係，夫人劉英過去同毛較熟，過一段時間總是建議一起去看毛，他多以“主席那麼忙，又沒什麼事，打攪人家幹什麼”為詞推託。據我幾次目睹，他見到毛除談正事外

⁴⁹ 《張聞天文集（四）》，中共黨史出版社1995年，第216~242頁。

⁵⁰ 因稿件係我起草，所以他要我跟他一起送呈總理，以便有指示時回來修改。總理未看就說不用了。可見是早已商定的。另可參閱蔣洪斌：《陳毅傳》，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701頁；劉樹發：《陳毅年譜（下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12頁。

⁵¹ 從1955年起，許多外事活動，如參加在萬隆舉行的亞非會議、陪總理出訪、接見重要外賓的陪見等，已多由陳毅出面。

(或沒正事，如參加跳舞)，就只是沉默寡言，倒是劉英在旁可以搭上話。總之，使人感覺到張聞天同毛澤東之間存在著無形的隔閡。

在毛澤東方面，本來就看不起張聞天，延安整風後就更不在話下了。對張聞天喜歡發議論、提意見，他並不以為然。有些他認為正確的意見而加以採納，也只是視為“從群眾中來”，並不認張的賬，如關於新中國的經濟構成。張的一些報告，他至多是批給大家看。如1959年廬山會議開始時，對張報上來的在外交部務虛會上的總結發言〈關於若干國際問題的意見〉曾批示：“印發各同志，很可以一看”，⁵²也就如此而已。實際上，建國後毛對張已越來越厭煩，有時講到歷史問題也是有意褒王稼祥而貶張聞天（如說“遵義會議王稼祥投了關鍵的一票”）。在毛看來，延安整風後張聞天內心並未服，思想並未通。因為延安整風樹起的一個正確與錯誤的標準就是以對毛的態度劃線。此後，隨著個人崇拜的不斷昇級，這一標準也越來越嚴。個人崇拜的天然要求是歌功頌德和少提以至不提缺點與批評。張聞天並不是不瞭解這點，但他從思想上就反對個人崇拜，既不會歌功頌德和順著來，又喜歡揭露缺點和提意見，所以使毛越來越反感。下面的例子很能說明問題。張1958年4月到上海、杭州參觀訪問，26日寫信向毛澤東彙報，本想在肯定和讚揚大躍進的同時指出存在的問題和缺點，後經一再考慮，定稿時還是刪去了要提的缺點和意見，只剩下讚揚。毛看後認為是張的進步，遂於5月8日回信說，“你這個人通了，我表示熱烈的歡迎和祝賀。我一直不大滿意你。在延安時曾對你有五個字的批評，你記得嗎？進城後，我對陳雲、恩來幾次說過，你有嚴重的書生氣，不大懂實際。記得也對你當面說過。今天看這個報告，引起我對你熱情歡迎”。接著說，上述看法，“可能對你估計過高，即書生氣，大少爺氣（說張聞天有“大少爺氣”，可謂毫無根據地信手拈來——作者註），還沒有完全去掉，還沒有完全實際化。若果如此，也不要緊，你繼續進步就是了。但你過去能寫出現在的報告嗎？能有這樣的無產階級感情嗎？能有這樣感人的氣氛嗎？在我看來，沒有。現在有了，通了，群眾化了，因此向你致

⁵² 張培森主編：《張聞天年譜（下卷）》第1147頁。

賀。”⁵³ 轉錄這麼多，不但是為了說明毛喜歡報喜不報憂，也為了活靈活現地顯示出毛的“帝王”氣魄，對張聞天這個“臣下”已毫無平等可言，同時還暴露他對搞崇拜自己的人很容易受騙（所以康生“值得信賴”）。因為不久後的事實證明，張聞天並沒有“通”，而且真正脫離群眾、“不大懂實際”的也不是張聞天，恰巧相反，而是批評者自己。否則中國的生產力和生態環境不會遭到那樣嚴重的破壞，不會有三年困難和餓死三四千萬人。從發展軌跡看，進城後兩人的思想就漸行漸遠，距離越來越大，個人關係也日益變得貌合神離。張對毛是敬而遠之，毛對張是厭惡、歧視以至侮辱。特別是政治路線和思想作風上的分歧，使他們之間的衝突成為不可避免，並終於在 1959 年的廬山會議上爆發了。而其結局又說明，延安整風立下的以毛劃線已發展成鐵的紀律，個人完全凌駕於一切黨規國法之上。在這種情況下，中國人民再經歷 20 多年的苦難（反右派、大躍進、三年困難、社教四清、“文革”十年），也就沒什麼奇怪了。

張聞天一直忠於馬克思主義。廬山會議後他雖受著屈辱的待遇，不斷的批判、不斷的檢查，還從 1962 年 9 月起被“專案”審查，取消參加中央會議和閱讀中央文件的資格，但仍孜孜不倦地鑽研馬列理論和中國的實際問題，寫出了大量筆記和文稿，提出許多獨到的見解。但由於當時的處境，他不得不採取一些特別的做法，即送請毛澤東審閱指正的文稿，都是較虛的理論問題和反修、頌毛的學習筆記，另外一些確有見解、雖儘量含蓄但仍顧慮有犯忌內容的材料，就沒有上報。例如《張聞天文集》收集刊印他在廬山會議後的文稿共 30 篇，其中除一篇關於集市貿易問題給毛並中央的報告、一篇談純理論的〈關於生產關係的兩重性問題〉外，其餘 28 篇都沒有報送過毛。其實，就是報送毛的許多讀書筆記和報告文稿，毛也基本上不看。據說連那篇談集市貿易的報告都沒看，還是從康生嘴裡聽到的。在一次中央會議上，康生進讒言說，張聞天現在和孫冶方又在搞利別爾曼⁵⁴

⁵³ 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7）》，中央文獻出版社 1992 年，第 212 頁；張培森主編：《張聞天年譜（下卷）》第 1090 頁。

⁵⁴ 葉·格·利別爾曼（1897~1983 年），烏克蘭人，經濟學家，1962 年 9 月著文提倡在蘇聯搞點經濟改革，如擴大企業權限、重視利潤指標和物質刺激等，被我國當時輿論視為經濟學界現代修正主義代表人物。

一套。毛說，好啊，讓他們去上街（指鬧事）。那篇建議開放市場的報告也就成了張聞天的翻案活動和一項新的重大“罪行”。

張聞天雖然對廬山會議以來的批判內心並未服氣，正像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所承認的：1962年1月中央擴大的工作會議，使我覺得我在廬山會議上發表的一些觀點是沒有多大錯誤的，會上的反右鬥爭是過火的。⁵⁵但他為了照顧大局和使自己能留在黨內，還是不斷地檢討，特別是寄希望於毛澤東並經常寫信。據《張聞天年譜》主編張培森統計，從廬山會議後到去世前共給毛澤東寫了32封信（先多後少）。⁵⁶內容主要是順著毛的恭維的話和提點要求，如：附送報告文稿和讀書筆記、彙報思想和工作以至被鬥情況、對重大政治事件的表態、要求作結論和分配工作以及要求接見等。可惜，毛澤東沒有再見過他，他的信也大多沒有下文。廬山會議後對他的認罪信，毛有“我以極大的熱情歡迎洛甫這封信”⁵⁷的批示，並曾送給他看過，此後他再沒得到過任何回信。據《張聞天年譜》記載，僅1960~1962年，張給毛就寫了13封信。毛有批示的七封。其中五封只是批給幾位中央領導同志傳閱和存檔。另兩封有些內容。一封是參加八屆九中全會後致函毛，表示擁護毛的講話，並懇切申明“裡通外國”是“實屬莫須有的事情”，但仍決心放下包袱，做好中央分配的調研工作，“無負於一個共產黨員所應盡的責任”。毛1961年1月22日看過批道：“已電話告張聞天同志，信已收到，看過，同意他對問題所取態度。”另一封是參加1962年初“七千人大會”後給毛的信，表示擁護劉少奇的報告和毛的講話，並附送〈關於蘇共危機的感想〉一文。毛於2月22日寫信給劉少奇、鄧小平說，“張聞天同志來信一件，意見一件，請考慮印發常委、書記處各同志，再加陳伯達、康生、定一同志。請他們研究一下。此人是個動搖分子，累犯錯誤。他說的是否可信，值得研究”。⁵⁸此信也從側面說明，毛對“七千人大會”

⁵⁵ 張聞天1968年8月28日所寫材料。

⁵⁶ 2001年10月28日，張培森查實後告知何方——作者註。

⁵⁷ 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8）》，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第461頁。

⁵⁸ 張培森主編：《張聞天年譜（下卷）》第1167~1168、1182~1183頁。

和劉少奇報告不盡如意。1962 年後，毛對張的來信已很少置理，只有 1965 年對來信中的兩封批示傳閱存檔。但是毛對張聞天並沒有置諸腦後和不再關注，包括緊張混亂的“文革”時期。和一些有意為毛澤東開脫的說法⁵⁹ 相反，毛對以前的中央領導人，包括早已打倒的張聞天，一直都極為關注。

“文革”中批鬥和遊鬥彭德懷和張聞天，在北京大概是無人不曉，何況毛澤東。而且對張聞天的待遇、處理和行止，毛也一直在關注著，無人可擅自作主。例如 1968 年 3 月 15 日，“王明、蘇修特務專案組”報告：鑒於張聞天的“罪行”和態度，建議將他和劉英送衛戍區“監護”。康生 4 月 12 在報告上批示：“張聞天問題要請示主席林副主席。”1968 年 5 月 17 日，謝富治手諭：“中央決定叛黨叛國分子張聞天、劉英二人在家實行監護”。1969 年 10 月 20 日，中央辦公廳負責人宣佈：毛主席批准解除監護，張的問題是人民內部矛盾，為戰備疏散，遣送廣東中小城市。此後，張一再給毛寫信，要求調回北京，恢復組織生活和分配點工作。1974 年 1 月 19 日，周恩來批示要汪東興落實毛澤東指示，讓張、劉參加地方黨的生活和工作。1 月 20 日廣東省委組織部即通知恢復張、劉組織生活，享受縣（團）級政治待遇。後來張給毛寫信，“希望回到北京生活和養病”。10 月 18 日毛答復：到北京住恐不合適，可另換一地方居住。⁶⁰ 據此，張要求以上海為養老地點，但被駁回。最後獲准去無錫安家，住不到一年即病逝於此，他和毛澤東的生前聯繫也就自然中斷。

綜上所述，可以看出，張毛二人談不上有什麼私交和個人友誼，也沒有多少學術交流和學問磋商，連聊天的共同語言都不多，他們的關係主要是建立在共同革命理念上的政治上的結合。那麼從政治著眼，也就是過去

⁵⁹ 如胡喬木所說，在“文革”中毛對彭德懷、劉少奇、賀龍、陶鑄等人在什麼地方、受什麼虐待等情況都不知道（《胡喬木談中共黨史》，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第 215 頁；《胡喬木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第 181 頁；《胡喬木回憶毛澤東》，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第 66 頁）。

⁶⁰ 張培森主編：《張聞天年譜（下卷）》，第 1268、1287、1290、1312、1316 頁。

強調的提到路線⁶¹的高度看，張毛關係的這三大階段大概可歸納如下。第一階段，即長征前，基本上是張聞天錯誤和毛澤東正確。說基本上，是因為張也有正確的地方，如反對文藝界的關門主義和在蘇區同博古的鬥爭等；毛也有錯誤的地方，如肅反中錯殺幾千幹部戰士和逼出“富田事變”又錯誤處理等。這個時期雖然還不能說毛有一條完整的正確路線，但當時是軍事第一，而毛在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和戰略戰術等根本問題上還是正確的。第二階段，從遵義會議到全國解放。這期間，雖然中間夾了個延安整風，雙方地位有極大變化，但政治路線上一致，基本上都正確。第三階段是建國後的20多年。在這個長時期裡，毛澤東也有一些建樹，但就全局看，基本路線是錯誤的，其根源大多可以追溯到延安整風。張聞天基本上是跟著毛澤東走的，但在許多問題上有自己的不同看法。歷史證明，這些看法是正確的。因此總的看來，可以說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毛澤東基本上是錯的，張聞天基本上是對的（只是就思想而言，行動上還得執行毛澤東的）。這三個階段，還可用張聞天自己檢討的話說，就是：遵義會議前，“當時我在中央工作，我是反對毛澤東同志的”；⁶² 遵義會議到延安整風，“還有點分庭抗禮的味道”，整風後開始信服，只是對審幹有過意見；⁶³ “對主席過去革命時期的一套方針、政策和辦法是相信的（革命勝利也已證明），但對這一套建設社會主義的新辦法，是否行，有懷疑。”⁶⁴

最後就相互態度來說，則可分為這樣三個階段。遵義會議前，張對毛是輕視與忽視；毛對張是內心看不起，表面還得應付。遵義會議到延安整風前，張對毛是尊重與崇敬；毛對張是表面尊重，實際上仍看不起。從整風起直到“文革”，張對毛是既有個人崇拜，又有不滿和意見，而且天平逐漸後傾；毛對張是不平等相待，政治上壓制，人格不尊重，從批評的諷

⁶¹ 在起草《關於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時，根據鄧小平的意見，一般不再提路線鬥爭，只是對以前的路線錯誤還用機會主義、冒險主義之類的稱呼。建國後的黨史已沒有這些帽子了，但像“大躍進”、“反右傾”、“文革”等不算路線錯誤算什麼？也可以“宜粗”掉了？

⁶² 1959年8月9日，張聞天在廬山會議小組會上的檢討發言。

⁶³ 1959年8月13日，張聞天在八中全會上的發言。

⁶⁴ 1962年8月17日，張聞天在十中全會西南小組會上的發言。

刺挖苦到藉口打倒，使張聞天過了 30 年一半失意和一半屈辱的生活。但就張聞天來說，他始終忠於毛澤東，如同在廬山和接著的第三次全國外事會議作檢討時所說，他的動機只是想提醒主席和中央注意，儘早認識與糾正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絕無意要反對毛主席，更談不到打倒了。他說，毛主席那麼高的威信，就是誰想打也打不倒。這確是他至死未變的想法和態度，因而對他後來的遭遇一直就感到委屈。平心而論，遵義會議後，張聞天確實對毛澤東只有合作、擁戴，而沒有一絲一毫對不起的地方。

關於張毛關係就寫到這裡。需要說明的是：第一，張毛的關係悠久而曲折，一本書也說不完，所以只能掛一漏萬地做點簡單回顧；第二，我是有意識地在這些敘述中儘量排除主觀的猜測和設想，甚至連我同張聞天十多年的接觸與談話都不加引用，更不用說主觀的估計和判斷了。對雙方關係力求做到實事求是，“不虛美，不隱惡”。

附錄二：張聞天與周恩來

周總理和張聞天都是見過大世面、具有世界眼光和時代觀念的人，外交思想比較接近是很自然的。再加上不知是否出於歷史的原因（張聞天做過黨的總書記，兩人同為延安整風中挨批的主要對象），他們一直都是互相尊重和互相照顧的。據胡喬木在紀念張聞天的文章中說，1958 年中央決定陳毅接任周恩來兼的外交部長時，曾考慮是不是把張聞天給調開，但周恩來主張把他留下來，說他在外交部搞得不錯，工作仔細認真。在平時工作中，周恩來比較尊重張聞天的意見，生活上也注意照顧，例如一再招呼晚上沒有急事不要叫醒聞天。一次在總理處召開黨組會，劉英和中組部的帥孟奇商量調李一氓當駐緬甸大使，一些黨組成員表示不同意，說他在和大（中國人民保衛世界和平大會）和人的關係搞不好。周恩來也覺得李一氓有點文化人的吊兒郎當，對他當大使不完全放心。但張聞天認為，那樣一位老同志，又是名人，就不能去緬甸當個大使？何況他做了外交工作

後作風已有改進。最後總理還是同意了張聞天的意見。還有個令我一直記掛在心的事，就是 1959 年廬山會議後沒有見到周恩來對張聞天的批判。開了差不多一個月批張的全國外事工作會議，他只到會講了一次國際形勢和階級鬥爭等問題，批判了彭德懷，也沒特別批張聞天。因為他一直管外交，張聞天和毛澤東的許多不同看法可以順手拈來，但他並未提起，此後也從來沒有聽到他提過。張聞天不但同意周恩來的不少外交思想，而且也很佩服他“不知疲倦的工作精神”（這是張常說的話）。由於一些思想相通，所以周恩來受到批評時，張聞天往往表示同情，有時兩人還站在一起。例如 1954 年日內瓦會議後，毛澤東批評沒有及時突出臺灣問題，張聞天就曾私下表示不以為然。1956 年國內反冒進時，張聞天也在外交部大講反對鋪張浪費，反對在外援上打腫臉充胖子。後來周恩來遭到反“反冒進”的批判，張聞天不但表同情，而且認為他不應來外交部一再檢討。至於兩人在外交上的看法一致和互相支持，那例子就更多了。

當然也不必隱晦，周恩來和張聞天兩個人之間還是有些矛盾和相互看不慣的地方。例如張聞天就一直認為總理有事務主義的毛病，事情管得太具體，對下面不放手。特別是他認為，總理對形勢政策研究不夠，也不太重視基本業務如規章制度等的建設；可以花很長時間接見個別記者或中外人士，卻沒時間及時審批一些重要文件如年度總結和規劃等；有時參加使節會議或外事會議的代表等候總理接見，得等上一兩個月，一次等了兩個多月，最後宣佈總理沒時間，不見了，讓大家回去。張聞天對這些都很有意見，我也聽見他在部務會議上正式提過。但是反過來，周總理卻認為張聞天有點偏重研究和務虛，對具體工作抓得不夠，特別是對交際工作沒興趣，會見外賓不積極。這最後一點也是張自己在會上挑明並且做了自我批評的。

在我跟他們兩人工作中，對他們都很尊重和景仰。但有一次兩人發生了衝突，我也被捲了進去。這就是 1957 年初在外賓接待問題上矛盾暴露和總理當眾發脾氣的事。說來也話長。

我們好像一直有個內外有別和好做表面文章（難免弄虛作假）的傳統，對上邊來人檢查、外頭來人參觀、特別是外賓來訪，都要做好回答問題的應對準備，打掃沿路和參觀單位的衛生，當然更少不了盛宴招待、送禮留

念，等等。在我的印象中，這一套在延安整風後就開始了。1944 年接待中外記者代表團和 1945 年接待政協訪問團時就這麼幹過。對外賓接待，建國後特別重視一定要搞得場面宏大，招待豐盛。周總理和陳老總又喜歡講排場、圖好看，弄得接待外賓的工作，不僅是對外交部，也使一些地方和部門感到不勝負擔，怕接待不周，受到上面批評。有一次范長江就當著我的面向張聞天訴苦說，建國初期邀請烏蘭諾娃來華演出，她因為不適應北京的氣候有點傷風感冒。於是總理把他叫去訓了一頓，說：斯大林的掌上珠，被你們當成了路旁草；立即以大姐（指鄧穎超）的名義，送一件貂皮大衣給她。所以有外賓來，地方不知如何接待就請示外交部，有時外交部派一個科長或科員去打前站，竟可在省市裡指揮一切（例如一次在湖北武漢就是這樣）。

對這些，幾位副部長和禮賓司部分同志都有意見，地方上也有些反映。尤其是張聞天，他認為在外賓接待上規格太高，造成過分的鋪張浪費，也違背國際慣例（如群眾夾道歡迎、請客送禮太濫太豐盛等），並且公開批評，說這和援助外國、支持世界革命不自量力一樣，都是打腫臉充胖子，因此一再提倡進行禮賓改革。也許是乘國內反冒進之風，主管禮賓司的姬鵬飛副部長領人去了一些省市視察外事處工作，回來就讓秘書李頡寫了一份反映接待外賓鋪張浪費的材料，舉了不少可笑的事例，如緬甸文工團訪華臨行送禮中有每人毛皮上衣一件，這是帶回去永遠也用不上的。材料寫成後，姬批讓辦公廳主任董越千修改。他看後不滿意，又批叫我修改，定稿後他才批示辦公廳送新華社《內部參考》發表。

對這件事，從內容到做法，我都同意，但意識到這是針對總理的，因此多了點心眼，除事後報告張聞天外，還特意保留了姬鵬飛的四個批條。張聞天從外地回來，知道這件事後立即打電話給新華社社長吳冷西制止，但吳冷西說不但已經刊出而且也已經發出去了。正好當天懷仁堂有晚會，張聞天遇到鄧小平，建議全部收回這本《內參》。不料鄧小平卻滿不在乎，說反映一點情況有什麼關係，何況還是在《內參》上，用不著收回。張聞天同我商量補救辦法，我也沒轍。而且無獨有偶，正是在這件事的前後，張聞天原先佈置禮賓司起草的禮賓改革方案，在徵求各方意見後已形成正

式文件，張聞天就報請代總理陳雲和鄧小平審批。但陳雲是個謹慎的人，他說這是周總理管的事，還是等他訪問回來再說。在歷時三個月訪問亞歐11國之後，周總理一行於1957年2月6日回國，3月7日在國際俱樂部一次酒會結束後，當著外交部領導的面（張聞天沒參加），沒指名批評分工管禮賓又在場的姬鵬飛，卻故意指名並不相干的喬冠華，發了一頓脾氣，說以後請客沒錢了就用我的工資。大家心裡都明白是怎麼回事，但沒人吭氣，只有賀龍和喬冠華跟著敲邊鼓，說他們的工資也可以拿出來。張聞天和外交部醞釀好久的禮賓改革，從此也就束之高閣。據說，直到文化大革命後，中國的禮賓規格才經過幾次改革，逐漸固定了下來，大致與國際慣例接上了軌。

禮賓問題講得這麼囉嗦，因為這是張聞天和我本人在1959年外事會議上挨批鬥時的一條重要罪狀——“反總理”。實際上，根據我的觀察，無論是張聞天還是周總理，後來好像都沒把這當成一回事。他們的關係依然不錯，所以才有一年後陳毅接任外交部長時，正是周恩來主張讓張聞天繼續留任的事。

附錄三：張聞天與陳毅

我回到外交部就聽說陳毅一再提出想做外交工作，後來也確實看到他參加的外事活動特別多，超過所有其他國務院副總理，顯得非常突出。但在他的分工中除常務外有政法、文教、科學院和部分國防，卻沒有外交。1955年隨周恩來出席萬隆亞非會議，1956年在黨的八大會上就國際形勢和外交政策作發言，陳毅要做外交工作的大局就已基本上看定了。但不知由於什麼原因，直到1958年2月才宣佈他代替周恩來兼任外交部長。有的書上說，這是因為反“反冒進”，要削減周恩來的權限。看來不大像。無論是在這之前還是在這之後，周恩來都是大力支持陳毅管外交的，陳毅也始終欽佩和服從周恩來對外交工作的領導。兩個人的關係一直相處得很好，

何況延安整風時他們還一同被看成是經驗宗派呢。陳毅來外交部，究竟對周恩來意味著什麼，現在仍然猜不透，但對張聞天意味著決不會受到重用，卻是當時就很明確，人們一下就看得出來的。這裡只就陳張二人在外交部共事兩年的關係，談談個人的一些看法和體會，因為這也是和我有關的。

對於陳毅來外交部，張聞天早就料到了，估計他的心情會是複雜的。他固然是個能上能下、不計較名義和地位的人，但是明顯地得不到信任，恐怕總會感到不那麼愉快。對於和陳毅相處，我看他也是矛盾的。一方面，他一直聽說陳毅坦率直爽，以為比較容易相處；另一方面，兩人終究沒有共過事，不完全能摸準對方的脾氣，這又使他的處境有點微妙或者說是難辦。大膽抓工作吧，他可能顧慮被懷疑為擅權，是不是目無領導；縮手縮腳、摸領導意圖或遇事退後，這又完全違背他的精神和性格。因為他是個三日沒工作就會“惶惶如也”的人。為了確定今後走向，在陳毅上任前他先去摸了一下底，主動找陳懇談。據他的《年譜》上記載，他事後檢討說，他是歡迎陳毅來任部長的，兩人也談得很好。陳毅強調他是專職部長，要每天來部上班，大小事都要管。面對這種情況，張聞天認為自己應該在工作上“儘量後退一些，請他抓起來”。張還向辦公廳作了佈置，為部長每天來上班作好準備。於是辦公廳就給新部長收拾了一個全部最大的辦公室，並根據他的愛好，買了一些古色古香的書櫃和一批線裝書。至於張聞天自己，為了讓陳毅更多和更放手地抓工作，減少可能的干擾（大約也流露出一定的個人情緒），在陳毅來後採取了幾項他所說的“儘量後退一些”的措施。一是建議設兩個常務副部長：自己仍然留任，但偏重於形勢和政策的研究；另一位為章漢夫，著重日常外交業務的處理。這一建議得到周恩來和陳毅的贊同，而且陳毅還表示，研究工作正是他的不足之處。二是從每天上下午上班改為只上午上班（實際上還是經常下午也來，因為那是“大躍進”時期，開會和要辦的事比較多）。三是成立綜合業務組，除為部裡起草文件報告、編寫內部通報刊物、接收原研究室的業務外，還為張聞天的某些研究工作服務。但是後來的事實證明，張聞天的估計和設想是錯誤的，他對陳毅的思想作風並不瞭解。陳毅上任後除去頭幾天來部裡主持開了幾次會（包括處理龔澎、喬冠華問題的四次黨組會）以外，並

沒有來外交部上班，後來也一直沒見過他來上班，還是在中南海內辦公。

根據我個人兩年的觀察體會，陳毅和張聞天的作風大不相同。張聞天始終保持著知識分子和文化人（是作家而不是詩人）的氣質。他的工作態度和作風，我們前面已經作了不少敘述，這裡就無須再囉嗦了。陳毅則是將軍（元帥）加詩人，作風顯得粗獷和豪放，工作放手，不拘細節，容易得到幹部和群眾的歡迎，但有時在外交場合就顯得不完全適應了。這裡順便舉兩個例子。一是1965年9月舉行中外記者招待會的談話，其中提到：讓美國帝國主義、蘇聯修正主義、日本軍國主義、印度擴張主義一齊都來吧，趁我們這些老傢伙還在，乾脆打完了再建設。當時可是嚇了外國記者一跳。二是1962年關於老撾問題的日內瓦會議期間，一天印度代表團團長、國防部長梅農來訪。這位老兄有點癩，拄了個拐棍。陳老總起身接待時開玩笑說，大家在討論解除武裝，你怎麼還帶著“武器”（指拐棍）。梅農聽了翻譯扭頭就走，怎麼解釋也消不了氣，弄得很尷尬。所以陳毅的外交作風簡直不能和周總理相比。而且他當部長，並不像跟張聞天說的那樣，“部裡什麼事情都要管，每天要到部裡辦公”，而是部裡的日常工作基本不管，更不用說深入部裡各單位檢查和指導工作了。作為黨組秘書和主管調研的綜合組長，在我的印象裡，除兩次使節會議和一次務虛會議外，幾乎沒有參加過陳毅專門召開的有關國際形勢和外交政策以及內部業務的研討會。一些重大問題如炮打金門和中美會談，反而是周總理在直接抓。當時熱門的中蘇關係，則屬黨際問題，外交部很少插手。最近我又翻閱了一下陳毅和張聞天的《年譜》，特別是他們共事的1958年和1959年，就更加證實了我的印象。《年譜》載明，陳毅更多的是對外賓的歡迎歡送、接見陪見、設宴赴宴、參觀訪問，以及在文化界、科學界和軍方的出面，看不到在外交部主持研究形勢、政策和內部業務的條文。張聞天正好相反，對外活動比較少（這既與他的地位職務有關，也是他不喜歡交際這個缺點的表現），而參加有關形勢政策及外交業務的討論會或找相關人員談話則比較多。我們就以1958年12月下半月為例，來做一個對比。陳毅有九次外事活動（多為歡迎歡送、接見、簽字等），一次陪劉少奇等接見國內婦女代表，去河南視察一個禮拜。張聞天有一次外事活動，參加討論國際形

勢和對外關係以及外交業務的黨委會五次（討論機關黨委編印的《國內通訊》和年度總結規劃的頭兩次會，陳毅是否參加不清楚，從會議內容看，沒參加的可能較大；後三次陳毅已去河南），同回國大使談話三次，召開條法司和幾所大學的專家座談國際法教學一次，參加國際關係研究所研討會一次，召集有關人員討論駐外使館統一領導一次。也許這半個月的對比過分突出，但這確實很有代表性。這種差別很大的兩種作風和性格，不發生矛盾和衝突那才怪呢。這就是1959年廬山會議後張聞天所檢討的，“但是後來發現我後退了，他（指陳毅）對我有不滿，說我遇事推委。對他的意圖，我一時摸不清楚”。其實，根據陳毅的性格和作風看，他的“意圖”很清楚，就是只進行些大面上的活動，外交部的一切工作仍照以前那樣由張聞天等幾個副部長和各單位去辦，他主要是承上啟下，對重要文件向上照轉，再大一點的事情自有周總理以至毛主席抓。所以張聞天的“後退”，很快就使矛盾表面化了。

陳毅來部三個多月，外交部召開了務虛會。在討論了一天解放思想和外交躍進之後，陳毅號召大家給部領導提意見，特別強調，周總理委託他要大家對自己過去的工作進行批評。由於陳毅新來，大家自然不會有什麼意見；對總理，也不便多說什麼，只是膚皮潦草地講了些現象。在陳毅的一再要求下，張聞天在十多天後有準備地對總理的領導加以充分肯定後提了三點意見，即：對具體事務和技術性工作抓得多，對形勢政策研究不夠；黨組會開得少了；同部內各級幹部聯繫接觸少了。這時，不料陳毅話鋒一轉，批起了張聞天，並且從延安整風講起，第一次公開講出了毛澤東對張聞天“狹、高、空、怯、私”五個字的指責。由於從來沒聽說過，包括我在內的很多人都感到很吃驚。接著大家對張聞天提了一些意見（因他長期主持常務，人們意見多點也是自然的）。在張聞天第二天被迫作出四點檢討（這是上了《張聞天文集》的）後，事情才告結束。最近幾年同劉英談起這件事，她說這是陳老總在釣魚，而聞天又是個書呆子，她和聞天當時也感到吃驚和不可理解。不過從表面上看來，陳毅和張聞天兩個人對這件事好像都沒有怎麼在意，一切還是原來的樣子，張聞天抓工作倒是更積極主動了些。